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评析

刘淑春 佟宪国

【内容提要】2019年是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8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三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共产国际是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的践行者。共产国际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进行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催生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为中共早期制定理论纲领和行动策略提供了指导，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给予了巨额经费援助，对中共的生存和发展壮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过程中也犯有教条主义错误，可谓“功过兼有”，我们不能因其“过”而否定其“功”。今天，重新审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的关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可为今后加强共产党人的国际团结和联合提供某些启示。

【关键词】 共产国际 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

作者简介：刘淑春（1954-），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732）；佟宪国（1954-），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参赞（北京 100005）。

2019年是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8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这三者之间存在着怎样一种关系呢？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发展，都与共产国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是外因变化条件与内因变化根据的关系。笔者认为，缺少了这个外因变化条件，中国革命者在黑暗中摸索的时间会更长，中国革命的道路会更艰辛。换句话说，共产国际在推动中国共产党建立，帮助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中国革命中流砥柱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一、共产国际是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的必然产物和践行者

有人不仅不承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所产生的重要作用，甚至对共产国际自身存在的必要性也提出了质疑。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相伴相生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各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形式上看，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但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因为世界上“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一切力量引起革命”^①。各国无产阶级面对的是它们的共同敌人，要战胜资产阶级，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相互支持，共同斗争。“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②《国际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讲的就是这种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组织和联合行动。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现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是根据这一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参与创立了全球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恩格斯为该组织制订的章程，确定了同盟的目标：“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③事实上，同盟的这一目标也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指南。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以“第一国际的先驱”之名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册的。真正的国际无产阶级联合组织，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64年创立的“国际工人协会”。该协会的法国支部于1871年参加并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巴黎公社运动。随着巴黎公社运动的失败，各国资产阶级也加强了对本国工人运动的镇压，“国际工人协会”变得难以开展工作，于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

1889年，根据新的国际形势需要，恩格斯在巴黎创建了第二国际，也称“社会主义国际”或“社会党国际”。为反映第二国际与“国际工人协会”的继承关系和同一宗旨，“国际工人协会”自此被称作“第一国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内部发生分裂，国家社会主义派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与帝国主义战争；而以列宁为首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即国际派）提出，让本国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败北，无产阶级乘机夺取政权。第二国际在这种分裂中消亡。列宁为首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开始筹建第三国际。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所有参战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和鼓舞下，欧洲各国民主革命运动和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这在客观上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要求，以领导各国的革命运动。与此同时，在列宁和国际左派的推动下，1918年末至1919年初，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芬兰、希腊、阿根廷等国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或政党，为形成新的国际奠定了组织基础。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宣告成立。共产国际虽申明是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继承者，但又与前两个国际组织有所区别，体现了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代特点。共产国际把马克思恩格斯为以往国际组织确定的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目标提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日程。正如共产国际在其成立宣言《告全世界无产者》中指出的：“如果第一国际预测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并指出了未来发展的路径，第二国际将百万之众的各国无产阶级凝聚在自己周围，那么第三国际就是一个采取公开的群众性行动，实施革命性措施的国际。”共产国际的任务就是“总结工人阶级的革命经验，清除运动中起瓦解作用的机会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杂质，联合世界无产阶级一切真正革命政党的力量，从而加速取得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社会党人对资产阶级世界秩序的抨击足够了。国际共产党的任务是推翻这一秩序，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④简言之，共产国际的任务，就是组织各国共产党带领各国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6页。

④ Манифест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к пролетариям всего мира (6 марта 1919),《Правда》, № 52, 7 марта 1919 г.

显而易见，共产国际并非某个革命领袖人物主观意愿的产物，也非可有可无的组织。它是 20 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一脉相承。1943 年 5 月，随着各国共产党的壮大和成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了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共产国际宣布解散。

共产国际在其存在的 24 年历史中，为保卫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苏维埃俄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推动共产党在世界各地的建立和壮大以及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和策略指导、经费支持、干部培养；为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反封建、反殖民的解放运动提供了支援，将这一运动与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反对资本的斗争结合起来，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为团结世界进步力量，共同战胜法西斯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共产国际的成员党遍及世界各大洲，到 1943 年共产国际解散时有 68 个共产党，党员人数达到 400 多万^①。这些共产党带领各国人民开展了波澜壮阔的反对资本压迫和谋求解放的斗争，为 20 世纪社会主义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由此可以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70 多年的历史中，共产国际虽然只存在了不到 1/4 世纪，但它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壮大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红色政权的建立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二、共产国际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催生出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共产国际的推动和帮助。

1. 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理论和组织准备

共产国际在中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契合了正在苦苦求索救国救民之道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张申府等的诉求，大大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共产国际成立于 1919 年 3 月。仅仅一年之后，共产国际就于 1920 年 4 月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遣维经斯基（Григолий Наумо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一行五人（包括华籍翻译杨明斋）来中国，在这里一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一边物色可以与之合作的中国共产主义者。维经斯基等人在北京找到了李大钊，又经李大钊和张申府牵线搭桥，与已经迁至上海办《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等人建立了联系。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情况，并开始为筹建中国共产党作思想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同年 5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亚书记处在上海建立，成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据点。7 月，东亚书记处的中俄通讯社在上海设立，该通讯社除了把中国报刊上的重要消息译成俄文发往莫斯科外，还在中国的《新青年》《民国日报》等多家报纸杂志上刊发关于苏俄、共产国际的资料信息，向中国人民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为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舆论准备。8 月，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在上海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紧接着，李大钊在北京，毛泽东在湖南，王尽美在济南，董必武和陈潭秋在武汉，陈独秀和谭平山在广州也相继建起了共产主义小组。远赴国外留学的旅日、旅法学生也在当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与此同时，上海还建起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

^①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第 188 页。

党的外围组织。

经过这样一番紧锣密鼓的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2. 共产国际为中共早期制订理论纲领和行动策略提供了指导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大力帮助下成立的。除了建党之前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给予的帮助和指导外，1921年6月，共产国际又派遣马林和尼可尔斯基来到上海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列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一大。一年之后，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决议，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支部。从1921年中共成立之初，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在中国一直派驻自己的组织机构，并在中共中央派驻自己的代表，以协助贯彻落实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中共最初的党纲、政纲，包括统一战线和联合国民党的政策方针，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制订的。中共六大的各项政策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各项政策法律文件，也是先由莫斯科的苏联专家制订出来然后译成中文的^①。周恩来在延安时讲过这样一件事，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于莫斯科召开之前，斯大林找时任中共领导人谈话，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一个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斯大林指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的二月革命为例说明。这样，中共领导人才懂了。六大前，中国党是不懂这个问题的^②。

为加强共产国际与中共的联系，从1928年至1940年，中共中央先后派出多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常驻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其中最著名者有瞿秋白、张国焘、王明、王稼祥、任弼时等。

3. 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共产国际和中共都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无论在中共成立之前，还是在成立之后，共产国际和苏俄都曾十分重视为中共培养骨干力量。

1920年9月，维经斯基利用中俄通讯社，在上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同时在《民国日报》上刊登招生广告，为有意赴俄学习的有志中国青年进行预备培训。这里成了中共最早的干部学校。1921年春，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湖南学子经长沙船山学社贺明范校长的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推荐来学社接受培训。

派有志革命青年去苏俄接受培训，与苏俄建立培训各国革命党人的教育机构是同步进行的。1920年9月，共产国际在巴库召开东方民族大会，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下简称“东方大学”）。斯大林亲自担任名誉校长。到1924年，东方大学已成为苏俄国内最大的共产主义大学，有160多名老师和来自东方国家的1000多名学生，其中中国学员约占1/3。1925年秋，为纪念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苏联又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将原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转入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骨干力量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先后在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著名中共领袖除前面提及的刘少奇等人外，还有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汪寿华、邓小平、叶挺、关向应、刘伯坚、李富春、蔡畅、王一飞、柯庆施等数百人之多。党史中的许多知名人物，如张闻天、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何克全（凯丰）、陈昌浩等也都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

因此，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专家尼·列·玛玛耶娃看来，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所产生的

^① 参见杨奎松：《揭秘：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真实关系》，《北京日报》2011年5月16日。

^② 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8页。

影响，并不单纯是理论方面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与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①。

4. 共产国际对中共提供巨额经费援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其成员构成和经济地位决定了其在建立根据地或者夺取政权之前，不可能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和经费来源。从建党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共产国际以及苏俄给予中共的经费援助，对中共的生存和发展壮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1920年开始建党起，中共就面临着经费严重短缺的问题。根据陈独秀在中共二大和三大期间的相关信件、报告，以及张国焘1929年的回忆可知，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不得不全面接受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援助。从中共二大以后，共产国际即开始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预算，按月向中共党、工、团等组织提供固定的活动经费，有特别事项则还需要提供各种特别经费。到1927年，各项经费加起来，莫斯科提供给中共的经费已不下100万美元^②。1933年以后，中共中央被迫撤离城市，全部工作都转去农村，中共和中共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力量主要依靠打土豪、分田地、向根据地人民筹粮筹款，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经费援助的依赖状况，开始自给自立起来。

1934年夏秋之间，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莫斯科与中共中央及其各地的武装力量失去联系，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的经费援助也基本停止。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共中央决定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之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才得以恢复，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的经费援助也得以恢复。1937年9月，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致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转达毛泽东、张闻天要共产国际再度按月提供经费的请求。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答应给中共150万美元，还表示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将提供3万美元用于救治从监狱被释放出来的同志。总之，全面抗战初期，除去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资，共产国际和苏联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总计221万多美元，扣除英镑汇率下降造成的损失和没有兑现的40万美元，中共中央总共收到180多万美元。这些经费作为抗战时期中共获得的最主要的外来援助，有力地支援了中共领导的抗战事业，帮助中共度过了那段最为艰苦的岁月^③。

三、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功过是非

就共产国际对共和国革命所产生的影响而论，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功过是非有过一个很中肯的评价。这个评价于1960年7月由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讲了出来。毛泽东把共产国际存在的24年分成三个8年，认为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它在各国党的建立和成长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各国党成长了，成熟了，共产国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④。

周恩来作这个报告时，正值中苏交恶、两党论战开打的大背景下。中共没有全面否定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共建党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所给予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尽管共产国际在其中期，即1927年7月至1935年7月，助长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共、中国工农红军以及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带来了灭顶之灾，但毛泽东、周恩来仍实事求是地认为：“共产国际

① 参见《莫斯科东方大学：培养了一批中国革命的中坚》，《深圳特区报》2011年11月2日。

② 参见杨奎松：《揭秘：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真实关系》，《北京日报》2011年5月16日。

③ 参见南展：《延安时期，中共的抗战经费从何而来？》，《文史博览》2017年第6期。

④ 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0页。

的成立，当然是必要的。它对各国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① 距离毛泽东和周恩来作出这个评价又过去了近60年，通过我们在本文前两节中所作的考察，我们认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共产国际的评价至今依然是中肯的。人们不能因共产国际后来解散了而否认它存在的必要性，也不能因它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而否认它对中共和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

关于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的功绩，除了前面所指出的贡献外，共产国际还两次促成国共两党的合作，为中共的发展壮大以及成为执政党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根据共产国际二大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确定了党在当时阶段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策略。一开始，在共产党与国民党要不要合作、以什么形式合作的问题上，共产国际的代表与中共领导人之间有分歧。最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3年1月12日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确定国共合作是必要的，合作的前提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须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确立为国民党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促进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高潮的到来。以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为榜样，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以湖南、江西、广东的农民协会为先导，土地革命轰轰烈烈；以黄埔军校的两党学员为骨干，北伐战争势如破竹，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仅从1922年至1923年，中共就从一个只有400名党员的秘密小党，发展成为一个拥有5.7万名党员并掌握着上百万工农民众的群众性政党了。

为了全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救国图存而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具有更加伟大的意义。第二次国共合作来之不易。它是在10年内战的硝烟未散，国民党军仍在围追堵截红军，共产党人的鲜血尚未凝结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没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亡国灭种威胁，国共要结成统一战线是极其困难的。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支持下，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排除各种干扰，坚持了下来，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1937年至1945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从只有两三万军队、两万多名党员和占据陕甘宁十几个荒僻之县，发展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支重要政治力量不仅成功地度过了八年艰苦抗战，而且成为拥有100万军队、120万党员和1.5亿人口，占据西北、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大片敌后根据地的重要革命政党，拥有了足以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保卫自己胜利果实的强大实力^②。

正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制定的这些重大政策和策略，使中共的政治斗争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促进了中共力量的发展壮大。但是，共产国际在中国也犯过严重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过严重损失。1922年至1927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第一次国共合作促进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但共产国际没能预见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新的代表人物蒋介石、汪精卫之流会向共产党及一切进步力量举起屠刀。尚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考虑到要抓枪杆子，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的武装。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汪精卫的“七一五政变”，直至“宁汉合流”，这一系列背叛革命事件打了中共一个措手不及，使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从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共产国际进入了自己的中期，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又犯下了很大的错误。共产国际根据1929年至1933年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大萧条，断定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于是，它不顾各国革命条件是否成熟，强力

① 《周恩来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0页。

② 参见杨奎松：《揭秘：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真实关系》，《北京日报》2011年5月16日。

推行革命进攻路线。这一路线导致中国先后出现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共产国际罔顾中国实际情况，以派遣钦差大臣的方式将毫不了解中国国情的王明和博古等人派来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1927年7月至1935年7月，中共的白区工作损失几近百分之百。中央机关不得不从上海迁往江西中央苏区。中共的红区工作也损失惨重，未能打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根据地丢了，红军不得不进行史无前例的战略转移——长征。若不是毛泽东在我党我军最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挽救党和红军，若不是中共在遵义会议上选择毛泽东作我党我军的领袖，中共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可能就被葬送了。

这些错误，有的是因共产国际领导者教条主义地运用革命理论而提出不切合实际的战略战术导致的，有的是因共产国际的使者缺乏革命经验瞎指挥造成的。

四、共产国际留下的经验教训和启示

如前所述，共产国际的出现、发展和解散，都是历史的必然。未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需要时，各国共产党的国际联合一定还会以新的形式出现。为避免共产国际所犯的错误重演，我们有必要对共产国际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梳理和总结。

事实上，在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或撰文或召开会议以示纪念。它们在总结共产国际24年的历史功绩和教训的同时，探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各国共产党国际团结的前景和可能方式。各国共产党一致认为，加强共产主义力量的国际团结是必要的。例如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就指出：“我们今天迫切需要共产主义力量之间加强联系。世界资本正变得更具侵略性和更加无耻。它彻底扔掉了‘民主’和‘人权’的面具。在这样的条件下，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团结提上了日程。这一任务只有坚定地坚持争取社会主义纲领的共产党能够胜任。”^① 分析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关系，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共产党实现国际合作和联合的首要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应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共产国际为推动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带领劳动人民把社会主义理论变成现实，制定了一系列理论纲领和政策策略，以指导各党的行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它不应强行要求各党不分国情地按照一个统一的纲领和策略行事。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不同，走向社会主义所要经历的发展阶段必然不同，斗争的近期目标也会不同，不应当也不可能都套用一个统一的行动模式。正如列宁所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② 早在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列宁就劝告西欧共产党人不要完全照搬俄国的革命，要因时因地选择适合本国的斗争策略和时机。

第二，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应该产生于本国土壤，了解本国国情，与本国的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对于一个党的兴衰存亡至关重要。当年，共产国际在苏联的大力支持下，开办教育机构，为各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政治领导人、军事人才。这些人学成归国后，大多成了本国共产党的领袖和革命的中坚力量。但经验表明，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应从本国的革命斗争实践

① Г. А. Зюганов: Бесценный опыт Коминтерна. <https://kprf.ru/party-live/cknews/183054.html>.

②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页。

中产生，应由本国共产党推举出来，而不应由共产国际指定或者从外面“空投”进去。中共的历史告诉人们，共产国际指定王明、博古作中共最高领导人，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惨痛教训一定要铭记。

第三，必须正确处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把各国共产党应相互支持的国际主义义务与其需得到本国民众支持的民族利益辩证地结合起来。共产国际在其存在期间，为各国共产党树立了正确处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之间关系的榜样。无产阶级需要国际主义，坚持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基本原则。在苏维埃俄国成立之初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许干涉苏维埃俄国”和“保卫苏联”，对当时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来说，是与本国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相一致的。俄国的无产阶级在世界无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最先突破防线，推翻了沙皇和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工人农民掌握政权、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样板。苏维埃俄国对于世界未来的意义，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意识到了，他们惧怕它，联手来围剿它。所以，在当时情况下，捍卫苏维埃俄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义务，因为一旦苏维埃俄国被扼杀，整个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将失去大本营，欧洲的革命浪潮、世界各国的革命浪潮都将被压制下去。同样，在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之后，在法西斯国家内号召工人农民及各界反法西斯力量打倒法西斯，保卫苏联，也是正确的。这样做归根结底也是在保卫其自身利益，不能被视为假国际主义之名，行狭隘民族主义之实，作了苏联民族利己主义的工具。

但各国共产党又是植根于本民族土地上的树木和森林，与本国人民包括大多数爱国的剥削阶级在外敌入侵时是一种鱼水关系。也就是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自己的祖国都不存在了，还如何谈带领本国人民群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因此，在抗战期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与国民党捐弃前嫌、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是一项正确的策略。但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共产国际和苏联要中共倾全力“武装保卫苏联”之时，它们的这一指示就错了。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存在，既可以牵制中国战场上的日军，使其无暇北顾，又可以迫使蒋介石政府不敢像汪精卫一样倒向日本人的怀抱。所以，毛泽东破天荒地拒绝采取“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第四，各国共产党谋求国际团结是必要的，但形式应因时因需而定。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经验来看，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国际合作和联合是必要的，毕竟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是人类解放事业的必由之路。换言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未完结。在这一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各国共产党应像列宁当年劝告欧洲共产党人那样，做好本国的事情，为创造条件和迎接新的高潮做扎扎实实的准备工作。同时，即使哪一天需要建立共产党的国际联盟，它的运作形式也不会重复共产国际的做法，应该给予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本国事务的权利，成员之间应是平等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俄]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十月的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事件与回忆》，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列著作编译部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

[2] 李忠杰：《伟大的历史起点——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若干重要史实》，《人民日报》2016年6月26日。

[3] 刘宋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光明日报》2011年6月28日。

[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编辑：张晓敏）